

序

《韻海鏡源——音韻文字論集》

讀後

喬全生

黃耀堃先生的論集取名為「韻海鏡源」，實乃意蘊雋永，耐人尋味。因為《韻海鏡源》是唐顏真卿成書於唐代的一部集音韻、文字之大成的皇皇巨著。黃先生的論文集所收的 14 篇論文也是集多年音韻、文字研究之大成的鴻篇巨帙，尤其在對某一學說、術語或思想源流的考察方面尤見功底。我想這應是黃先生借取顏真卿書名的一大共性；此外，黃先生與顏真卿還有一個共性的地方就是：顏真卿是唐代著名的書法家，黃先生也是音韻學界藏而不露的書法大家，其隸書古樸淳厚、雄渾蒼勁。借《韻海鏡源》

以命名也足可窺見黃先生的良苦用意，實可謂「絕配」。

論文集共收入黃先生論文 14 篇，根據內容大致分為三類，一是對具體音韻學相關問題的討論（第 1、2、3、4、5 篇），二是對古今音韻學家理論思想的探究（第 6、7、8、9、10、11、12、13 篇），三是文獻考證（第 14 篇）。

我拜讀三類論文後的總體感受是：第一類，立足文獻，探討源流。考察《廣韻》、《盧宗邁切韻法》、《四聲等子》、《解釋歌義》等經典文獻音韻問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深入探討了唐宋分辨音節結構的方法、漢字三拼制注音的歷史、《解釋歌義》中「頌」和「義」的來源、見母列位等問題，考察細緻、論證嚴謹，很多觀點頗具創新性；第二類，立足韻學，探求思想。對戴震、段玉裁、王力、潘重規等學者音韻學理論的來源及變化進行分析和總結，使讀者既能深入了解先賢韻學思想，又能用歷史發展的觀點來對待；第三類，立足文本，探索用意。就劉毓崧〈唐元和寫本說文本部箋異跋〉對抄本的年代及摹刻問題進行討論，立足文本、揣摩作者言辭用意，提出自己新的認識。

綜觀 14 篇論文，無論材料、觀點都具有原創性。又可概括為以下兩點：

(1)廣徵博引，證而有據。文集參考引證了大量文獻資料，古今中外相關研究成果也悉數論及，觀其注釋及參考文獻可見一斑。除經典文獻外，還運用了大陸學者難以見到的材料（如日本國立

公文書館藏《重編改正四聲全形等子》)及日本學者平田昌司、尾崎雄二郎、上田正、大矢透、木下鉄矢等人的學術觀點，使讀者能夠比較全面地了解該問題的研究現狀。此外，文集還特別注重文獻的版本比勘，如〈讀戴震《聲韻考》筭記——論段玉裁與韻圖之三〉，考證《聲韻考》版本多達 7 種，通過對稿本和幾種版本異同的比較，發現了戴震對聲韻學說認識的發展變化，條分縷析，令人信服。

(2)視域廣闊，多有創見。文集雖以討論音韻論題為主，但從多種研究視角切入，得出了許多有獨創性的結論。如：根據宋刻本《歷代地理指掌圖》、元人吳恕《校刻上海圖歌活人指掌》中並無掌圖的情況，¹ 認為「『指掌』一語，並非專謂掌圖」；通過歸納宋元助紐字的特徵、分析袁子讓《五先堂字學元元》中的「切腳」，² 以探究漢字注音「三拼法」的來源；分析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對《廣韻》的態度，認為段注要「建立起一個貫通古音和今音的體系」；考察見母字列韻首的起源，認為這種做法反映出南宋音韻學風氣的轉變等等。這些觀點的提出，為後輩學者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文集在解決學界疑惑問題的同時，也提出一些新的問題，以供學界研究思考。如《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的成書時間，《四聲等子》與《五音集韻》的關係，「考古」、「審音」兩派的

¹ 《四庫未收書目輯刊》第 4 輯第 25 冊。

² 明萬曆三十一年（1603）。

劃分是否有意義，《聲韻考》的修訂與兩個「皖派」集團的關係等等。這些議題的考證難度很大，但對音韻學、漢語史乃至語言學及相關學科研究有重要意義，值得有志之士潛心鑽研。

通讀論文集，可以發現黃先生「信」、「博」、「細」的治學特點。「信」體現在嚴謹的邏輯和詳實的論證；「博」體現在豐贍的文獻引證和跨學科的視角觀察；「細」體現在逐字逐句的比勘與客觀深入的分析。

魯國堯先生指出：「對學術而言，『多元』、『爭鳴』、『創新』是生命之源，繁榮之本，恆久之根。」¹黃先生十分注重音韻學與資訊技術的結合，早在 2000 年，黃先生就發表文章〈中古韻圖電腦化研究〉，介紹韻圖電腦化的經驗。這部論文集所收文章，從文獻材料、觀察視角到觀點探討，處處均體現出「多元」、「爭鳴」、「創新」的治學理念，是語言學研究的典範之作。

黃先生不僅在音韻學研究方面建樹頗高，在詞義、詩律、文字和方言研究方面都有涉獵，特別是在粵方言史研究方面也頗有見地。論文〈四十年代的粵方言高入聲〉提出了上世紀 40 年代粵方言高入聲變讀為短促高平調的證據。〈《唐字調音英語》與二十世紀初香港粵語的聲調〉利用域外文獻探討百餘年來香港粵語

¹ 魯國堯：〈「多元」「爭鳴」「創新」的音韻學——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十一屆學術討論會暨漢語音韻學第六屆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辭〉，《古漢語研究》，2000 年第 4 期，頁 2 - 4。

陰平調以及高平變調的問題，反映了百年前香港粵方言語音面貌，對構建粵方言史具有重要的價值。此外，黃先生也是「楚辭」研究的專家，〈從《史記》論〈懷沙〉的文本與韻讀〉、〈〈漁父〉的韻文注——《楚辭章句》韻文注研究之一〉、〈論《楚辭》與《萬葉集》的反歌——兼論〈抽絲〉的「亂辭」與〈反離騷〉的性質〉等多篇論文都值得認真拜讀。

無論是音韻學的研究，還是楚辭、漢語方言、文字等方面的研究，黃先生始終堅持從文獻出發，依據事實堅實可信，所得結論令人信服。這種重文獻考證、無虛妄之言，棄浮蔓之辭的文風，這種實證主義的治學方法一直是我們音韻學界的研究傳統，也是我們始終倡導和堅持的重要研究方法。前賢給我們留下的巨量的古籍文獻正是我們漢語音韻學、方言學、文字學、訓詁學等相關學科研究的寶貴財富。學術研究必須以充分的、可靠的、窮盡式的文獻為基石。近百年來，我們的語言學研究，尤其是漢語語言學研究主要是在「亦步亦趨」的模式中，跟著「西方語言學理論」走。認為漢語的歷史僅僅依靠歷史文獻是無法構建的，錯誤地認為歷史文獻記錄的只是歷史上的某個片段，這些歷史記錄未必就符合「語言學」的標準，必須放棄「漢語歷史文獻」。這種學說或指導思想對我們的漢語研究是十分危險的，甚至是極其錯誤的。漢語有浩如煙海的文獻典籍，這是任何西方語言學都無法媲及的，放棄基於歷史文獻的語言實證，一味追隨西方語言學的理論假設，無異於邯鄲學步、鸚鵡學舌，很難有學術創見和突破。只有充分

利用歷史文獻，從中國的語言實際出發，才能擺脫對西方語言學研究理論的盲目崇拜，構建屬於我們自己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在這方面，黃先生給我們語言學人樹立了一個正確的典範。

魯國堯先生曾在《黃耀堃語言學論文集》序言中讚譽黃先生的研究具有「實實在在」、「高深」、「治學面比較寬」、「促進中日學術交流」的特點，並引用《晉書·孫綽傳》孫興公的話，稱讚黃先生的研究是「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韻海鏡源》依然體現了黃先生強調確鑿語言事實，注重文獻推究考訂，提倡原典充分解讀的治學風範，這是我們所有語言學人都值得學習的樸實文風，更是年輕學者應該繼承和發揚的治學之道。

不敢為序，權作讀後感。

2021年歲末於陝西師範大學語言科學研究所